

# 怀念吴征镒先生

郑儒永

(1931~)，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吴征镒先生离开我们整整一周年了，他的音容笑貌、温淳敦厚的形象一直留在我的眼前。虽然我既不是吴先生的学生也没有在他具体领导下工作过，但和他的交往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至今已有六十多年。

我在1953年大学毕业后被国家统一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刚刚成立的，并由戴芳澜先生任主任的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工作。众所周知，中国科学院实行导师责任制，毕业生分配到研究所后在指定的高级研究员（研究员或副研究员）负责培养下工作。我被分配到戴先生名下，自然非常高兴和感到十分荣幸。没想到抵京报到后，戴先生让我到标本室整理当时刚刚由原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以及北平研究院征集到中国科学院的全部与真菌有关的标本，要进行统一标本包装、统一标本标签等工作。当时研究所规定：每一个研究实习员和助理研究员每周可以占用半天到一天半的时间进行业务学习，参加所里开设的课程或到大学去听课均可。每次考核，我都名列前茅，这才引起了戴先生的注意，时隔四年之后，方才让我离开标本室的管理工作并自选一个课题进行研究。

我从文献上得知，在真菌分类工作中，存在问题较多和较难解决的类群有镰刀菌、毛霉等。我先选了镰刀菌，戴先生说：“镰刀菌是半知菌，还是选毛霉吧。”在正式立题研究毛霉之前，戴先生让我先把标本室历年积压下来，无人研究过的小煤炱菌目（*Meliolales*），以及虽经他本人研究过、但后来没有继续全部鉴定完毕的白粉菌目（*Erysiphales*）标本进行研究定名，以便入藏保存。这两类标本都是专性寄生菌，正确定名的先决条件是它们的寄主植物必须先得到正确的定名。一般常见的寄主植物，可以由本所标本室的一位自学成材的专职技术员韩树金鉴定，他遇到困难时就带着标本到植物研究所去请教匡可任先生解决。植物所从北京搬迁到昆明后，真菌寄主的鉴定遇到问题时，就只有把标本通过邮局寄到昆明解决。

吴征镒先生是戴先生的多年好友，吴先生每次到京开会必会到所看望戴先生，戴师母也一定会把吴先生请到家中吃饭。当时戴先生名下有四个学生，我成家最晚，单身的时间最长，戴先生在家中请客时，戴师母总会把我叫上当陪客。吴先生和戴先生一样，公私分明，开会外的个人活动从不乘坐大会提供的小汽车，而一定是乘坐出租车前来，饭后也是乘坐出租车回宾馆。早年北京的出租车很少，很难临时在路上拦截得到，事先预约又很难把时间定得很准。吴先生每次从戴先生家饭后出来，都是在我陪同下到马路上去拦截出租车回宾馆的。

1999年我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先生和师母段金玉先生都很为我高兴。每次参加中科院的院士会议，报到的时候，我一定会向报到处的工作人员打听吴先生和段先生的房号，段先生也会在报到处留话让我到他们的房间去见面。那时，吴先生已因腿脚不便乘坐轮椅代步。尽管吴先生参加的是高等植物组，我参加的是低等植物组，段先生还是对我说：“女同志细心一些，我对你比较信任，你能否替我先把吴先生和他的轮椅推到他的组去，然后才到你自己的组去开会？散会后最好也能由你把吴先生推回来。”我当然乐于从命，不过不同的组散会的时间往往会有先后，为了不耽误



吴先生回屋的时间，我每次到自己的组去开会时，都会挑选一个靠近门口的座位，一听到高等植物组散会，立即出来把吴先生送回房间。

还记得有一年，我和吴先生都参加了在悉尼大学举行的世界植物学大会，在开会前和不开会的时候，吴先生和我常常一起在大学的校园内采集标本。第一天吴先生告诉我说，“南北半球的植物完全不一样”，于是把标本采压作成小标本带回住房查书定名。第二天吴先生对我说：“你把采到的真菌标本也让我替你写上寄主学名吧。”吴先生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和执着，以及乐于助人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